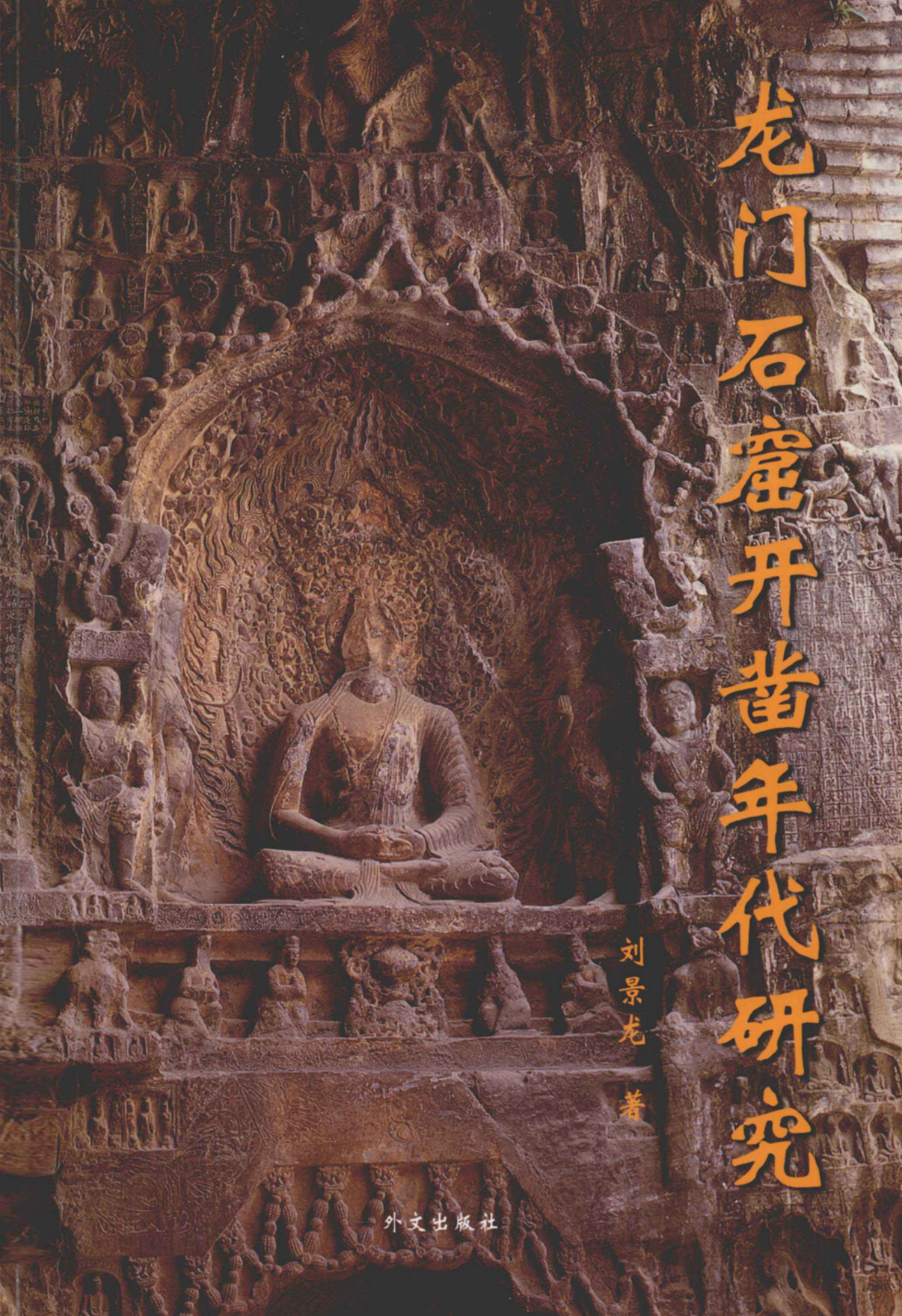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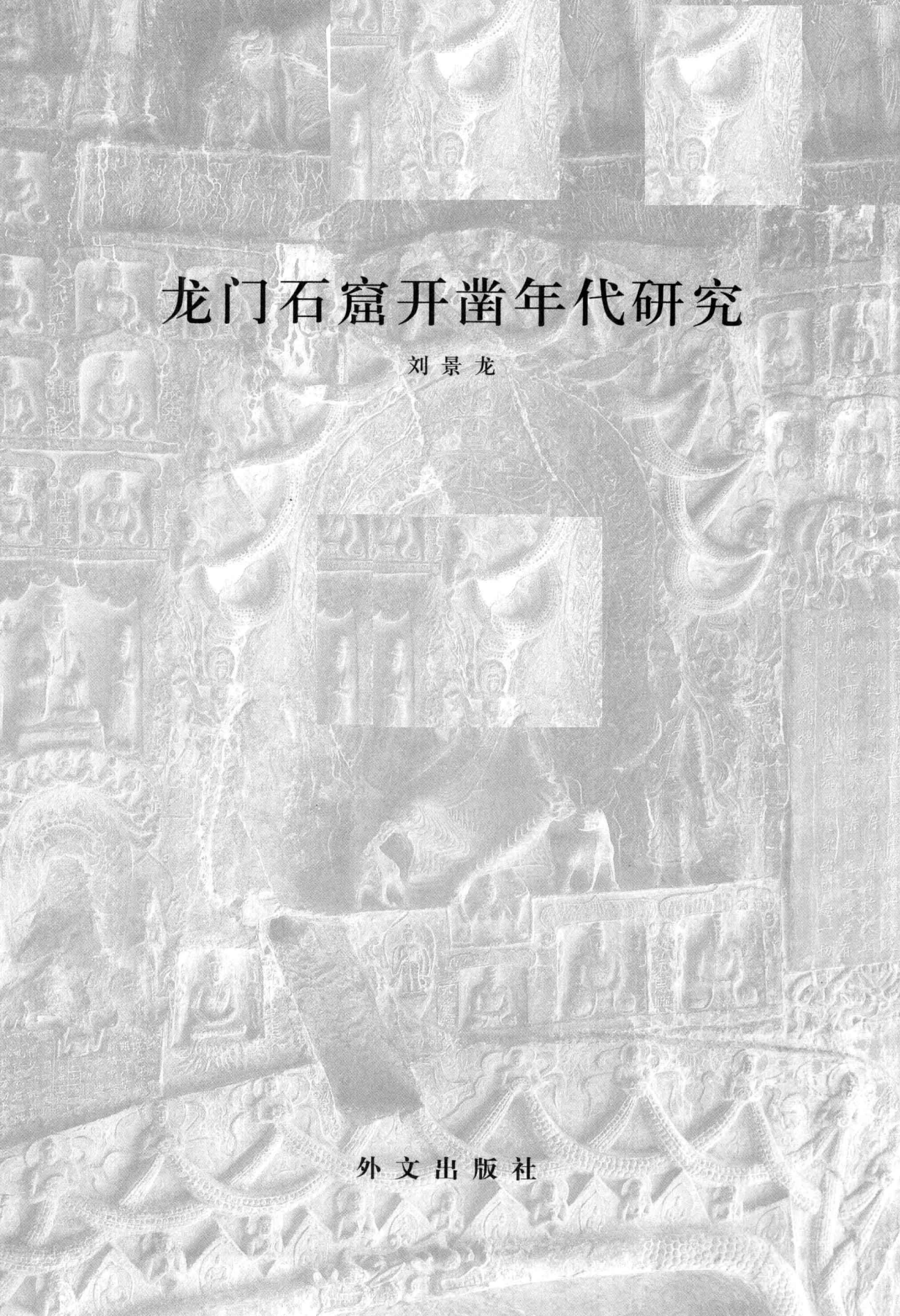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刘景龙 著

外文出版社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刘景龙

外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 刘景龙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3.10

ISBN 7-119-03442-1

I. 龙… II. 刘… III. 龙门石窟—研究—汉、日 IV. K879.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987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策 划 范 伟

作 者 刘景龙

责任编辑 刘承忠 刘 慧

封面设计 孙喜征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推广发行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制 版 北京奇彩嘉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20 千

印 数 0001-2000 册

印 张 4

版 次 2004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7-119-03442-1/Z · 651 (外)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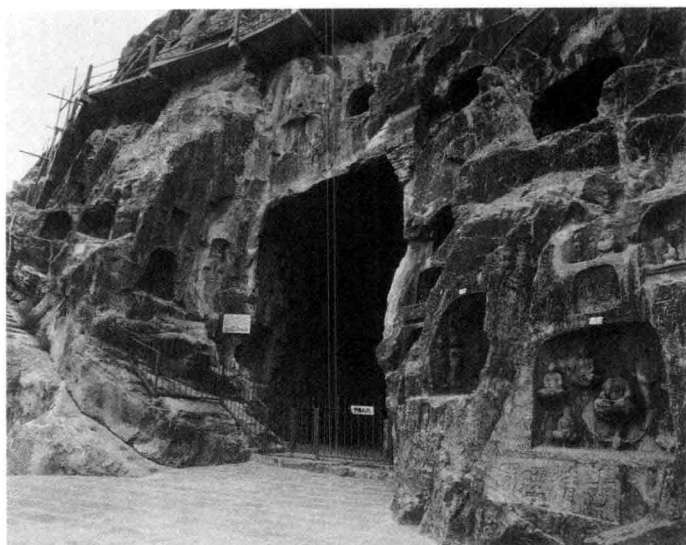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1
龍門石窟の開鑿年代について	13
图 表	
(图表1) 有纪年可考的造像龕 (西壁)	25
(图表2) 有纪年可考的造像龕 (北壁)	26
(图表2) 有纪年可考的造像龕 (北壁)	27
(图表3) 有纪年可考的造像龕 (南壁)	28
(图表4) 有纪年可考的造像龕 (窟顶)	29
实 测 图	31
拓 片	45
彩色图版	57

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研究

刘景龙

洛阳地处中原，伊、洛、瀍、涧四条河流经，是中国历史上六大古都中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东汉明帝遣使者赴大月支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被尊为“释源”。到西晋洛阳和长安已成为两大佛教中心，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西方极乐世界已成为人人盼望的最终归宿地。

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国都由平城迁都洛阳，皇家的佛教造像中心也由平城的武州塞(今云冈石窟)转移到洛阳的伊阙，即今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特点是：造像记之多在中国诸多石窟中当首，造像记中又多刻有造像年代。龙门石窟居石灰岩质地不易风化的地质条件，与云冈石窟相



图版 1 古阳洞外景

比，比云冈石窟保存的要好，此条件为石窟造像的断代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龙门石窟所居于龙门山与香山断块，地块的岩体主要由中上寒武纪白云岩和石灰岩组成，力学强度大、抗变性好，但具可溶性。地块内有构造裂隙和卸荷裂隙，石窟中距南界草店断裂带较近的奉先寺以南区域，构造节理密度相对大，最易造成滑移、崩落的卸荷裂隙较密。加上喀斯特地形中溶洞、溶沟多，为石窟造像、刻记造成了一定的不利条件，也为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对龙门石窟的研究宋代已有人著书立说，二十世纪初，国人关百益、法国人沙宛、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关野贞及瑞典人阿斯瓦德、喜龙仁等都有专题性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文儒、宿白、金维诺、马世昌、温玉成、李文生、宫大中；台湾的陈清香；日本的东山健吾、曾布川宽及意大利纳波里大学的福安敦等都发表了卓有水平的论文。本人一：初中毕业、学识浅薄。二：专事



图版2 古阳洞内景及主佛前下方石狮

具体开凿年代，则有不同的观点：有依据北壁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龕题记中“太和二年”的“太和二年”说^①；有依据南壁新城县功曹孙秋生造像龕题记的“太和七年”说^②；有认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龕题记中“太和二年”的“二”前残泐一“十”字的“太和十二年”说^③；有认为新城县功曹孙秋生造像龕题记的太和七年的“七”字前脱漏一“十”字的“太和十七年”说^④；有认为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题记中“太和九年”的“九”字前脱漏一“十”字的“太和十九年”说^⑤和“太和七年”前(公元483年)说^⑥等等。1993年，龙门石窟研究所依据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说，召开了“龙门石窟开凿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图版3 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龕

石刻文物保护修复，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知识很欠缺。今就几十年在工作中现场观察到的和所见到的历史史料上记载对龙门石窟开凿年代问题的相关材料，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在龙门石窟开凿年代的研究上，多数研究者均以第1443窟即著名的“古阳洞”的开凿作为整个龙门石窟群开创的标志。而在对第1443窟的研究上，大家公认，南北两壁上层有序排列着的八大龕是有计划雕凿的。这八大龕是该洞窟雕造最早的佛龕，从考古学打破关系的方法现场考察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至于八大龕

对于龙门石窟始凿年代这一问题，本人在1998年编写“龙门石窟总录”^⑦进行洞窟文字著录过程中，从第1443窟古阳洞南北两壁造像龕的相互叠压关系和打破关系入手，再次进行了实地的详细考察，并查阅文献资料，与同时期的造像记对比，进行多方面分析，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证实该洞(龙门石窟)的始凿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公元478年)之前。

龙门石窟第1443窟古阳洞(图版1)系由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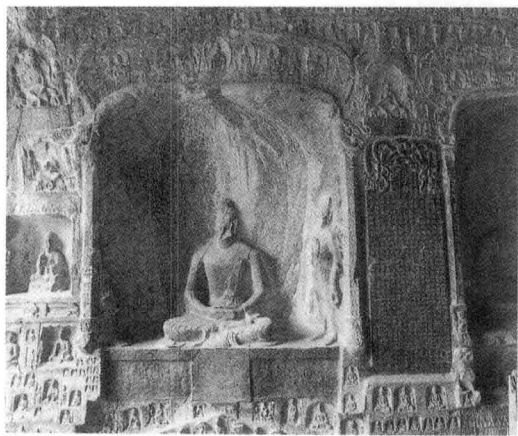


图版4 北海王元详造弥勒像龕局部

溶洞扩凿而成的，窟内(图版2)南北两壁有序排列着三层大龕，其上下密布着大小不同的1400余造像佛龕，编号的864个，统计造像数为13857尊。其中学术界公认最早开凿的是北壁134号、228号、234号、304号，南壁57号、66号、106号、111号八个大龕及其八大龕上方的若干佛龕。这些早期佛龕特别是早期有纪年的佛龕，周边相邻龕，研究其所依附的壁面情况，以及因不同年代凿造而形成的龕与龕之间的关系，无疑对研究其开凿年代至关重要。

在古阳洞北壁上层N230号龕东起第二龕即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龕，与上方N94号龕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N94号龕上方与N51号北海王元详造像龕相邻(图版3)。

北海王元详造像龕N51号，高138厘米，宽102厘米，深17厘米，造一铺交脚菩萨三尊像，龕下横向的长方框即佛坛，长107厘米、东端边高17厘米，西端边高16厘米，刻供养人行列(图版4)。供养人行列中，东侧刻男供养人十二身，东起第四人榜题“元宝”，第五人榜题“元善”；西侧刻女供养人十二身，东起第一人榜题“比丘尼明慧”，第二人榜题“比丘尼法真”，榜题姓名与南壁比丘法生为孝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龕下供养人榜题(图版5)多有相同。元详龕的男女供养人之间留有13.5厘米长一段空白岩面，其中有一呈人字形的裂纹与框上边沿的三角形缺口相连，其下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像龕，龕楣雕刻牵花绳童子形象的拱顶突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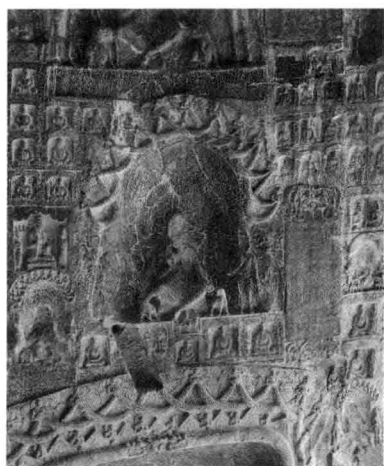


图版5 比丘法生造像龕

内6厘米,该处佛坛的高度仅10厘米(拓片1)。

N94号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图版6),高140厘米,宽106厘米,龕深21厘米,造一铺三尊交脚菩萨像。两侧下部龕沿浅浮雕胡服供养人像,龕楣刻十一童子牵花绳,雕刻精致而生动,富有装饰意趣。此龕的开凿年代早有争议,而它却是研究龙门石窟和古阳洞开凿年代的关键。

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而他启动改制的时间是太和十年,长乐王丘穆陵亮是孝文帝的高官,当然也是孝文帝改制政策的支持者和推行者,因此,在改制的大事上他只能支持,决不可能在孝文帝改制的第二年(太和十九年)还守旧,在造像龕上雕刻着胡服的供养人与皇帝改制大计作对,由此判断,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凿造时间在太和十九年以前,“九”字前本无“十”字的依据之一。



图版6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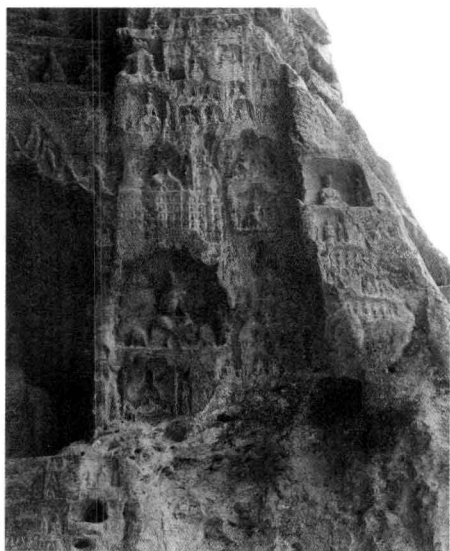


拓片1

北海王元详造像龕与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上下两者之间的特有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下龕圆拱形高浮雕龕楣的拱顶,突入到N51北海王元详龕下部佛坛浅浮雕供养人行列下沿的边框内。高浮雕的牵花绳童子像,立体面高出上龕供养人行列3.5厘米。位于该位置上龕的三身男供养人,足下无边框,均直接立于下龕的龕楣圆拱之上边缘。供养人像高多为14厘米,惟此三尊因位置所限,高仅9厘米;供养人像高低虽不同,但人物造型均完整无缺。由此,可以断定,北海王元详造像龕并非被下龕所破坏,而实是继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完成之后所开凿的佛龕。北海王元详的地位、道德等因所致,保护了下邻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

尉迟造像龕的完整。

龙门石窟古阳洞、莲花洞、火烧洞都是由天然溶洞扩凿成的，现今该窟底南侧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岩石地平，向北是极不平正逐渐向下倾斜的溶洞面地平，早期用水泥、片石填平，到窟北壁处已低下约80厘米。主尊座前下部衣摆直到窟底的溶洞是用块石补垒砌起来的，座北测是高100厘米、宽约60厘米的溶洞口。主佛前下方狮子的胸部向下都是溶洞溶孔，洞窟口北壁比丘慧成造像龕下方，溶洞口还保留着大小不同的溶孔。由此判断，溶洞是由该洞口北壁比丘慧成造像龕下方斜向主佛座下的。再就该窟顶的不规则形，也可能是溶洞所致。以上洞窟口北壁比丘慧成造像龕下方，溶洞口还保留着大小不同的溶孔(图版7)，可想窟内壁面造像、刻记位置难免有溶孔、裂隙和缺损分布。规整无缺的岩面当属少量。北海王元详造像龕下的供养人行列，男、女像中间有一段无雕刻的素面，其边框上沿有一三角形缺口，缺口向下的两条裂隙左、右延伸，形成人字形，雕刻师自然将这样不适宜雕琢的部位留作空白(拓片2)。



图版7 始平公造像龕下溶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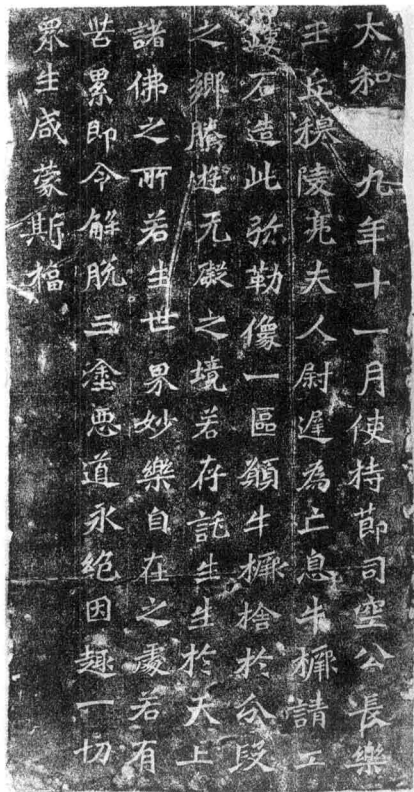
北海王元详造像龕东侧的碑形造像记，记述该龕开凿於“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其时“皇帝亲御六旌，南伐萧逆，军国二容，别于洛 汭(即洛阳与新城县交界处的伊阙)，行留雨音，分于(伊)阙外”。“太妃以圣善之规，戒途戎旅，弟子以资孝之心，戈言奉泪，其日太妃还家伊川”。“立愿母子平安，造弥勒像一区，以置于此，至廿二年九月廿三日法容克就，因即造齐，镌石表心，……维太魏太和廿二年九月廿三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造。”明确记载，该龕自太和十八年(公元495年)始造，至太和廿二年(公元498年)完工，历时四年。该龕下面的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雕凿时间无疑应当早于



拓片2

该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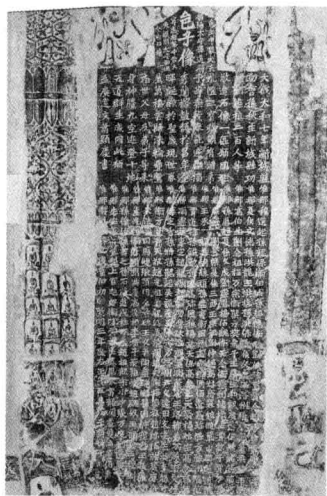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东侧的碑形造像记(拓片3),记曰:“太和九年十一月使持节司空公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请工镂石造此弥勒像一区,愿牛橛舍于分段之乡,腾游无碍之境,若存托生,生于天上诸佛之所,若生世界妙乐自在之处,……”。起首“太和九年”的“九”字前,岩石上有一处三角形缺口,刚好占去一个字的位置。缺口尖端的裂隙向西上方穿过,“丘”字和“镂”字延伸至碑首。此前,诸多学者推测缺口处当原有“十”字存在,但经本人考证认为,这一缺口同北海王元详造像龕下部供养人行列中间的裂隙属同一类型,都是在雕刻之前岩体裂隙或缺口已经存在,其位无法雕刻,致使供养人行列中间留下一块素面,造像碑“九”字下移。“十”字本无,并非竣工后脱落。



拓片 3

古阳洞南壁新城县功曹孙秋生造像龕的纪

年题为太和七年(拓片4),笔者认为无误。龕东侧的碑形造像记云:“大伐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新城县功曹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有愿弟子等荣茂春葩、庭槐独秀,……。孟广达文,萧显庆书。……景明三年岁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造讫”。“大伐”确系“大代”之异体,但强调“七年”为“十七年”之误则缺乏说服力。



拓片 4

我国传统刻碑程序是相当严肃认真的,书写、校对、镌刻无不郑重其事,何况此龕为“二百人等”所造,关注者自不在少数。新城县在龙门南仅15公里,即今伊川县城南古城村,当时龙门属新城县管辖。开龕造像的主持人功曹孙秋生、刘起祖都是当地有实权的地方官吏,操持之事非同小可。题记中署明了撰文者、书写者的姓名,这在2800余造像记中,殊不多见,

愈显行事之隆重。对其文辞、书法、镌刻及审校自必一丝不苟，焉能文首纪年即生错漏。在龙门石窟的造像记中缺字事例极少，近 3000 品刻记中只发现了三例，且当时也都查出补刻纠正了，如：第 712 窟莲花洞李琮造像记「见佛闻法大梁……」，「法」漏刻后补上。1443 窟古阳洞比丘道匠造像记(拓片 5)，「上为皇道更隆」、「果果依本」，「道」、「果」二字漏刻，后用小字补刻。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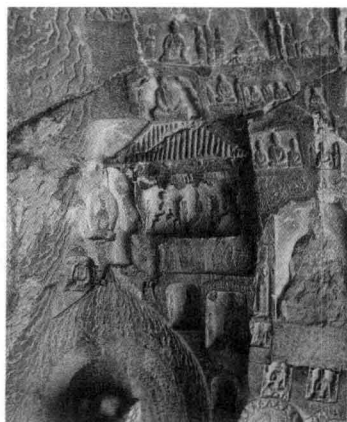
拓片 5

代的 565 窟惠简洞张元福造像记「雍州万年张元福」，漏「县」字，用小字补刻于「万」、「张」之间，县字用简体字。唐代还有两题记错字都于纠正例，如：第 543 窟万佛洞处贞造弥勒像记「永离盖缠」，「离」改作「度」，「盖」改作「脱」，用粗于原来字迹笔划刻在原字旁，除上尚未发现有漏字的造像记，更何况是地方官吏造像刻碑，能有一错竟造成十年之差，又未补上予以纠正呢？

多数学者认为，古阳洞营造过程的走向，是从窟口开始，由外向内逐步扩进，从古阳洞内造像龕编号图上对有造像记年龕的标注排列看，造像年代分布位置也证实了这一论理的正确性。从溶洞的走向与选择造像位置是先易后难的理论推测应是洞口由北壁先开，始凿于太和二年以前，南壁始凿于太和七年以前，从正壁主尊坐下 W92 号龕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座南侧 W69 号龕永平三年(公元 510 年)、和座两侧的窟壁上 W31 号龕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W11 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座前下 W112、W124 号两龕始平五年(公元 508 年)、W92 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的纪年和主佛两侧两协侍菩萨背光顶的 w3(图版 8)与 N1 两龕的位置、龕型、造像内容判断，两龕与主尊是统一设计规划、同时完成的姊妹龕，可惜仅 W3 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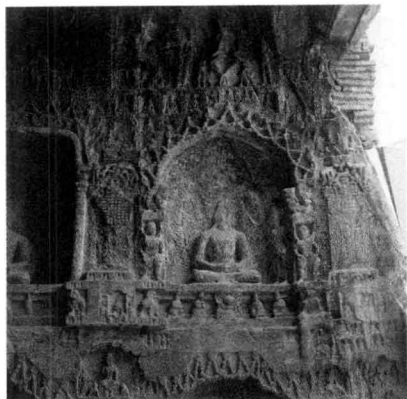
图版 8 元變造像龕 (w3)龕



(w39)龕

于正始四年(公元 507 年)有纪年，欣喜在它的上邻有纪年的 W2 号龕是景明四年(公元 503 年)，它们的完工时间都应在主尊完工后，由此推测，主尊的完工时间应在公元 503 年前，按造像记有造像起凿、竣工记载的孙秋生、北海

王元详造像龕凿造用工时间推测，主尊的刻造没有十年以上时间的雕凿是不可能完成的，主尊的始造时间应在太和十年(公元490年)前后。北壁上层大龕的东起第一座N304号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龕(图版9)也是古阳洞最早的佛龕，龕外东侧“龙门二十品”中惟一的阳刻碑记尤其引人注目(拓片6)。比丘慧成造像记，额题：“始平公像一区”；碑文云：“比丘慧成……为国造石窟□□，系答皇恩，有资来业。父使持节、光禄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奄焉薨，放仰慈颜，以摧躬□，匪乌在天，遂为亡父造石像一区”；碑文尾题：“太和□二年九月十四日讫，朱义章书，孟达文”。对此纪年，有多种说法。除前举“太和二年”、“太和十二年”之外，另一说认为，“二年”之前的空格内是“廿”字，原文应作“太和廿二年”。现场观察，本人认为“二”上两裂隙交汇处，有溶孔，无刻字条件，所以二年之前本无“十”或“廿”。



图版9 比丘慧成造像龕



拓片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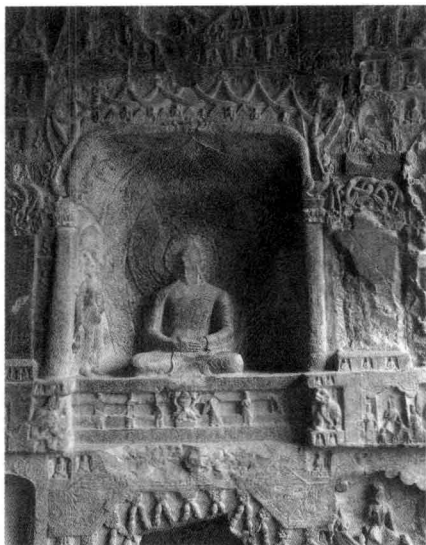
古阳洞诸多造像记中与牛撮造像碑同类原因的空格现象屡见不鲜。例如：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等造像记(图版10)(拓片7)的第四、五、七、九行，均因同一条裂隙而在镌刻时留出一字的空位。安定王元燮造像记(拓片8)，第二至四行位置，有一条从右上至左下的裂隙，造成题记文字第二行只刻下段四字，第三、第四行只刻上段二字和五字，皆避开裂隙经过位置不刻字。比丘惠感造像记(拓片9)第七行下端因岩石缺损而让出空白，少刻一字。上述实例虽有空位、空格但内容仍完整，文义顺畅，并不是缺字、漏字。在《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一书的编辑过程中作者、编者曾几次对造像记一一校对，极少发现有漏字的题记。由此可以推断：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龕，按现在所能识读的题刻纪年“太和二年九月十四日讫”，“二年”之上只是一空格，本人认为原本无“十”字或“廿”字的存在。该龕当於“太和二年”凿造完成，早于太和七年完成的“新城县功曹孙秋生造像龕”，也早

于太和九年雕造的“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是第1443窟开凿最早的大型佛龕。从其位置判断它是在溶洞口。一个僧人为其父造像，为节省投资，选此溶洞口位置是可以想得到的，今天观察造像记外侧及下部，还保留着溶洞的本壁面，造像刻记有小的溶孔存在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对始平公的记载，在《魏书》卷四《世祖纪》有记：神麤三年(公元430年)“九月己丑，赫连定遣弟谓以代寇鄜城，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率诸军讨之，擒贼将王卑，杀万余人，谓以代遁走。”除此未见其他记载。虽不知造像记中的始平公是否就是《魏书》所记始

平公隗归，但如果作肯定的假设，隗归自公元430年统军杀敌而于公元478年去世，之间相距48年，其子比丘慧成为之造龕，是基本符合人生年龄段的。若神麤三年(公元430年)至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相距68年，便显得年龄过长，难以令人信服了。

早在三国魏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四十二年，谴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魏书》卷一)可知北魏先祖早已与洛阳往来密切，接受中原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的影响。《魏书·释老志》：“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之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更有“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佛教已相当兴盛。北魏王朝在公元398年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与洛阳的来往当更频繁。以上都说明北魏王朝接受的应是洛阳的佛教文化。云冈石窟太和十三年出现受南朝文化影响的褒衣博带式服饰的佛造像，其经由中原洛阳(佛教)文化的传承应该是



图版10 魏陵藏造像龕



拓片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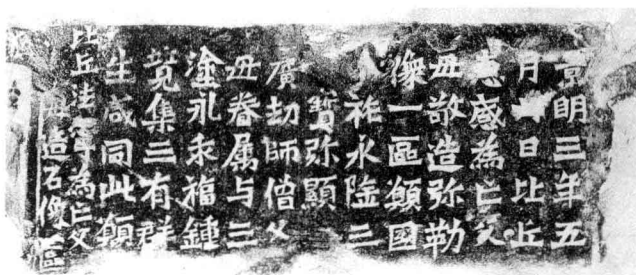
拓片 8

必然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东汉明帝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自此，由于皇家对佛教的提倡，由发源地向周边传播。《魏书·高祖记第七上》记载，“（太和）四年（公元480年）春正月，乾像六合殿成……丁巳，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洛阳伽蓝记》卷三：“报德寺，高祖孝文帝所立也，为冯太后追福，在开阳门外三里”。又云“太和四年（公元480年）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此说明孝文帝迁都之前官方已在洛阳建寺院。洛阳是中国佛教第一寺院的发源地，官吏、百姓信奉佛教较普遍是可想象得到的，僧人、官吏、百姓信奉佛教就要以建寺院、修刹、造（刻凿）佛像等寻找不同的供奉形式，所以文化发达的中国佛教发源地洛阳，在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之前早期出现民间开窟造像也是必然要有的。

芝加哥大学蒋人和先生在此问题上讲道：“供奉题记包含着对更早时期造像的暗示，如孙秋生碑记载了483年的佛像，慧成和魏灵藏碑则记录着它们各自的佛像显现了从前未曾清晰可见的灵踪。杨大眼愿文描述了一个从前皇帝的影踪，以及一次对古阳洞较早的访问。与两国主要的起源理论相反，这些暗示意味古阳洞的工作可能在官方的赞助下始于迁都之前，但是官方的赞助并未持续而被搁置，而后又重新开始。如龙门附近洛阳以南的报德寺，此寺系孝文帝为文明太后冯氏而建。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报德寺建背光该是在佛像大部分雕成之后刻出的，所以完成的时间应与奉献铭文的年代很接近……”。又讲：“古阳洞第三层佛龕里的带状火焰式纹与坐佛所穿袈裟样式似乎有冲突，……

只有一尊佛穿着新式较厚的长袍，而身光里的火焰纹则为带状。……但佛像却穿着较早样式的袈裟，因此佛像与壁面的花纹可能不是同一时期所雕刻的”。“按第三层



拓片 9

大龕的佛像及铭文分析,古阳洞应当是迁都之前刻凿的。线状火焰式身光与穿偏袒右肩袈裟佛像的年代应比迁都的时间要早,比云冈石窟第5、6窟的年代也要早。从雕刻风格来看,古阳洞可能在孙秋生……,还有其他铭文指出在公元494年前龙门就已经有石窟和佛像”。“古阳洞大约不是由皇帝本身供养开凿的,正因为没有皇帝的支持,所以才可能在前就中断,迁都后又需要多人的贡献才能完成”。“于480年,这就为北魏官方对洛阳工程项目的赞助远在迁都之前的论点提供了证据,也为古阳洞可能的起源带来了新的启示”^⑧。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前后,利用天然洞穴开始雕做若干小龕,大约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起,大型石窟的营造计划启动至正始二年(公元505年)之前正壁三尊竣工,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前后,正壁的余白部分雕凿完工”。

日本石松日奈子《龙门古阳洞初期造像的中国化问题》记述“古阳洞造像服饰的汉化从太和十九年至正始二年经历十余年岁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期间,可以见到西方式和汉式同处一龕的现象。可以想见,象云冈那样同形式的造像突然大量的出现,定有其契机与外在要因。古阳洞与云冈状况不同,历经反复的试行错误,自行产生了新样式”。

“古阳洞初期造像的形式并非云冈样式的继承和展开,而是以洛阳地区既存の様式为底色,融会汉文化的绘画、书法以及碑刻传统于石窟之中而产生的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性、高度汉化的造像样式……”。

对于石松日奈子的研究在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利用的是“九”上残“十”说,比丘慧成造像龕用的是“二”上残缺说。对此本人认为本无缺,太和九年,二年更符合文章后论的逻辑。正壁的完工时间应是位于主佛背光南侧边沿安定王元燮造像龕上的W2造像龕记“魏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岁次癸未十月□□造邑师惠□寿卢……”。因为它位于主佛背光边沿,正常情况下主尊完成后开凿小龕合乎情理。

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中国的佛教信徒、佛教造像的工匠也应从这里兴起,经过东汉到西晋近四百年的发展,在建寺、造佛技术上已有成熟的经验,而且几百年的磨练,定要造就一大批能工巧匠从事这一专项事业。古阳洞造像服饰的汉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历经反复的试行错误,自行产生了新样式”。这一段说明龙门石窟造像开始时间是迁都之前民间已以洛阳地区既存的佛教造像艺术为底本,开始开窟造像。另一方面,云冈石窟造像形式的“外在要因”也不能排除洛阳的造像工匠被招募或到国都平城找工赚钱,参加大力山(云冈)造像工程的设想。

宿白先生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指出:“云冈褒衣博带装束的佛像,有纪

年铭文可考的最早实例是11窟上方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铭释迦多宝龕。着右袒大衣的佛像,有纪年铭文可考的最晚实例是17窟明窗东侧的释迦多宝弥勒三像龕,龕铭纪年也恰是太和十三年。这个巧合,可以说明太和十三年应是这两种服制的交替时期。6窟佛像既已全部褒衣博带,表明该窟的竣工,应在太和十三年之后”^⑨。太和十三年完工的龕像,开工时间可追溯到更早。褒衣博带服饰风格既来自南朝,传入洛阳应该早于平城,洛阳当时兴盛的佛教艺术对迁都前的国都平城佛教艺术影响是必然的,皇帝在全国招募能工巧匠或能工巧匠和僧人到国都做工、传教完全可能。

孝文帝太和改制启动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无论如何,褒衣博带的出现,应该是这场社会变革的产物。古阳洞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龕两侧浅浮雕胡服供养人,未尝不可看作是孝文帝太和改制之前的表征,该龕的开凿显然是在迁都之前,题记“太和九年”也合乎情理。

综上所述,龙门石窟的开凿起始时间不是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之际,而应是在太和初年或之前。太和二年(公元478年)已完成的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龕是第1443窟造像最早的纪年龕。龙门石窟由皇家主办开凿的年代晚于云冈石窟(公元460年)的起凿时间,龙门石窟民间开窟造像起始年代当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二者之间的诸多关系也还需要学者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2001年在《古阳洞》书中已发表,今作了较大的补充、修改单独出版)

注释:

- ① 张乃翥《龙门石窟始平公像龕造像年代管窥》,《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 ② 金维诺《龙门石窟·序》,文物出版社1961年。
- ③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④ 温玉成《龙门石窟的创建年代》,《文博》1985年第2期。
- ⑤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的研究》,东京1941年。
- ⑥ 蒋人和《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早期佛像火焰式纹身光之演变及古阳洞起源的一些探想”。文物出版社1996年。
- ⑦ 《龙门石窟总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⑧ 蒋人和《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龙门古阳洞重构中的时间、文本和造像的歧异”文物出版社2000年。
- ⑨ 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P.79, 注10, 文物出版社1996。

龍門石窟の開鑿年代について

劉景龍

洛陽は中原に位置し、伊水、洛河、瀋河、澗河などの四本の河がその間を流れ、中国の六大古都の中で都として最も早く、もっとも長く使われた都市で、中華文明の発祥の地のひとつである。後漢の明帝が使者を遣し、大月支（今のアフガニスタン辺り）より白馬で「四十二章經」を背負ってきて、中国の一番目の寺院・白馬寺を建立した。さらに白馬寺を「釈源」と尊称されてから西晋に至まで、洛陽と西安は仏教の二大中心地となってきた。それで仏教は民間で広く伝われ、西方極楽世界も人々の憧れる最終の宿る所になった。

北魏の太和十八年（494年）に孝文帝が都を平城から洛陽に移し、同時に皇族の仏教造像の中心も平城の武州塞（今の雲岡石窟）から洛陽の伊闕（今の龍門石窟）に移されて来た。

龍門石窟の特徴のひとつは造像題記が中国石窟の中で一番多く、造像題記の上にほとんど造像年代も刻んでいること。そして、龍門石窟が風化し難い石灰岩質あるので、雲岡石窟より銘記の保存状態もいいので、石窟造像の年代を判明するに有利な手掛になったのである。しかし、龍門石窟は龍門山と香山の断面に位置し、ここの岩体が主に上中カンブリア紀の白雲岩と石灰岩で力学強度が強くて、結構が安定であるが溶けられることもある。それから岩盤の中には構造割れ目と押圧による割れ目があり、石窟中には南境目の草店割れ目に近い奉先寺の南区域の構造節理の密度がわりに大きいことで、岩体の滑り移し、崩落が容易に行ったことによる押圧割れ目がより多い。それにカルスト地質でカルスト洞窟と侵食によってできた溝が多くて、石窟造像と題記にある程度にマイナス影響にな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現在の石窟研究にもほどほどの複雑性をもたらしてきた。

龍門石窟についての研究はすでに宋代の人が本を書いたが、二十世紀の初めに邦人の関百益氏、フランスのサワン氏、日本の水野清一氏、長広敏雄氏、関野貞氏及びスウェーデンのアスワードル氏、喜龍仁氏などは初めて専門的な研究があった。中華人民共和国が成立後、閻文儒氏、宿白氏、金維諾氏、馬世昌氏、温玉成氏、李文生氏、宮大中氏、台湾の陳清香氏と日本の東山健吾氏、曾布川寛氏や、イタリナポリ大学フアントン氏の方々